

王永会 著

中国佛教僧团发展及其管理研究

儒道释  
博士论文  
丛书



巴蜀书社

王永会 著

中国佛教僧团发展及其管理研究

儒道释博士论文丛书

巴蜀书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佛教僧团发展及其管理研究/王永会著. — 成都:  
巴蜀书社, 2003.10

(儒道释博士论文丛书)

ISBN 7-80659-530-9

I. 中... II. 王... III. 佛教-组织-研究-  
中国 IV. B94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91598 号

责任编辑 杨宗义

中国佛教僧团发展及其管理研究 王永会 著

巴蜀书社出版发行

(成都盐道街三号 邮编 610012)

总编室电话(028)86656816

发行科电话(028)86662019

新华书店经销

西南冶金地质印刷厂印刷

电话(028)84122206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2

字数 270 千

2003 年 10 月第一版

2003 年 10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2300 册

ISBN 7-80659-530-9/B·75

定价:20.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工厂调换



### 作者简介

王永会，哲学博士，1974年生于河北曲阳，1996年毕业于四川大学哲学系，获法学学士学位。同年进入四川大学宗教教学研究所，攻读硕士学位，1998年提前攻读博士学位，2001年学成毕业。先后在《世界宗教研究》、《佛学研究》、《社会科学研究》、《宗教哲学》（台）、《四川大学学报》、《中华文化论坛》等专业学术刊物发表学术论文10余篇。

## 内容简介

佛教僧团作为佛教“佛、法、僧”宝之一，是佛教发展之基础。对其发展及管理制度作历史考察是佛教研究的重要方面，于全面理解佛教与佛教文化、加强佛教自身建设、促进佛教与现代社会的相适应、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意义重大。本论文对我国（汉传）佛教僧团及其管理体制的历史演变过程、不同时代的特点作了系统梳理，并在此基础上对我国佛教僧团及其管理发展的基本轨迹作了总结归纳，对当代僧团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及已有的改革措施作了分析，提出了未来佛教僧团管理的发展及其制度创新的可行方向。

## 《儒道释博士论文丛书》编委会

主 编：汤伟侠(执行) 卿希泰(执行) 杨继瑞

副主编：唐大潮 李 刚 潘显一

编 委(以姓氏笔划为序)：

|     |     |     |     |
|-----|-----|-----|-----|
| 尤汉基 | 邓锦雄 | 汤伟侠 | 汤伟奇 |
| 余孝恒 | 汪启明 | 杨宗义 | 杨继瑞 |
| 吴景星 | 李 刚 | 李卫红 | 陈 兵 |
| 陈国超 | 罗中枢 | 周田青 | 赵志铝 |
| 赵镇东 | 赵耀年 | 姜 生 | 卿希泰 |
| 唐大潮 | 翁永汉 | 黄小石 | 梁赞荣 |
| 潘显一 |     |     |     |

《儒道释博士论文丛书》由香港圆玄学院资助出版

## 《儒道释博士论文丛书》缘起

儒道释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三大支柱，源远流长，内容丰富，影响深远，它对中华民族的共同心理、共同感情和强大凝聚力的形成与发展，均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是我们几千年来战胜一切困难、经过无数险阻、始终立于不败之地的精神武器，在今天仍然显示着它的强大生命力，并在即将到来的新世纪里，焕发出更加灿烂的光彩。

自从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改革开放路线以来，我国对儒道释传统文化的研究工作，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在全国各地设立了许多博士点，使年轻的研究人才的培养工作走上了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的轨道，一批又一批的博士毕业生正在茁壮成长，他们是我国传统文化研究方面的一支强大的新生力量，是有关各学科未来的学术带头人。他们的博士学位论文有一部分在出版之后，已在国内外的同行学者中受到了关注，产生了很好的影响。但因种种原因，学术著作的出版甚难，尤其是中青年学者的学术著作出版更难。因此还有相当多的博士学位论文难以及时发表。不及时解决这一难题，不仅对中青年学者的成长

不利，且对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促进学术交流也不利。我们有志于解决此一难题久矣，始终均以各种原因未能如愿。近与香港圆玄学院商议，喜得该院慨然允诺捐资赞助出版《儒道释博士论文丛书》，这将是学术界的一大盛事，长期坚持下去，必然会产生它的深远影响。

本丛书面向全国（包括港澳台地区）征稿。凡是以研究儒、道、释为内容的博士学位论文，皆属本丛书的出版范围，均可向本丛书的编委会提出出版申请。

本丛书的编委会是由各有关专家组成，负责审定申请者的博士学位论文的入选工作。我们掌握的入选条件是：（1）对有关学科带前沿性的重大问题作出创造性研究的；（2）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有新的重大突破、得出新的科学结论从而推动了本学科向前发展的；（3）开拓了新的研究领域、对学科建设具有较大贡献的。凡具备其中的任何一条，均可入选。但我们对入选论文还有一个最基本的共同要求，这就是文章观点的取得和论证，都须有科学的依据，应在充分占有第一手原始资料的基础上进行，并详细注明这些资料的来源和出处，做到持之有故，言之成理，避免夸夸其谈，华而不实。我们提出这个最基本的共同要求，其目的乃是期望通过本丛书的出版工作，在年轻学者中倡导一种实事求是地、一步一个脚印地进行学术研究的严谨学风。

由于编委会学识水平有限和经验与人力的不足，难免会有这样或那样的失误，恳切希望能够得到全国各有关博士点和博士生导师以及博士研究生们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对我们的工作提出批评和建议，加强联系和合作，给我们推荐和投寄好的书稿，让我们一道为搞好《儒道释博士论文丛书》的出版工作、为繁荣祖国的



学术文化事业而共同努力。

《儒道释博士论文丛书》编委会

1999年8月5日

## 序

管理科学是当今社会科学中一个极具实用性的热门学科，研究者颇众。在将现代科学技术运用于企业、经济、社团等管理的同时，总结和继承古代的管理经验，是发展管理科学必要的的一个方面。

若论古代的团体管理，佛教僧团可谓最具有研究价值。释迦牟尼在菩提树下悟道成佛，走向人间传教度人后，逐渐建立了庞大的出家众团体，这一团体以共同的信仰为纽带，在同一导师的指导下修行，成员皆乞食为生，不事生产，不蓄财产，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团体。教团表现出超前的民主精神：废除印度世俗的种姓等级制度，所有成员不论姓氏、民族、出身，一律地位平等，对教团事务都具有发言表决权，大家按佛所教导的“六和敬”原则结合为一体，“水乳交融”、“无诤无竞”，人际关系和谐，道风清肃，树立了一个民主管理的社团榜样。佛教僧团组织之严密，戒律制度之完善，集体形象及管理效果之良好，生命力之恒久，在人类历史上是罕见的，可谓古代社团管理的成功典范，其管理方法，现在看来，即使对世俗的社团、企业、军队、党派、行政

等管理，也还有许多值得借鉴之处。

佛教素以佛、法、僧为“三宝”，三宝中的僧宝——僧伽团体，实际上是住持佛法的实体、主体，一直被强调为弘扬佛法、决定佛教命运的关键。而僧伽的兴衰，一直被认为在于管理，管理的关键，又在于戒律，在于大家能否按共同生活的准则来各自约束自己的言行，戒纲不振，必然导致僧团离散、腐化，道风衰败，从而使僧团的社会形象低劣，失去神圣性及人们的信向，最终导致佛教衰微乃至“法灭”。然僧团能否戒纲清整，又受社会文化环境的制约。由于多种内外原因，僧团从佛陀时代的清净和谐，逐渐走向贵族化、世俗化、腐化，最终导致佛教在多元文化竞争中失败，退出印度本土。因时势人心的变化，佛教在印度生存的一千余年间，教团所持守的戒律也适应时机，不无发展变化，从持守佛陀时代的出家四众戒进到兼持大乘菩萨戒，又在大乘菩萨戒的基础上演变出秘密戒。在南亚、东南亚流传至今的南传佛教，一般认为较多保持了原始佛教的本面，其实也适应流传地区的政治文化，形成了短期出家、政府管理等原始佛教中所没有的制度。

佛教输入中国后，沿袭印度佛教职制，逐渐建立起中国出家众的团体，一直为中国佛教的代表和核心。“出家众住持佛法，在家众护持佛法”，直到现在仍然是佛教界的老生常谈。南北朝以来，中国僧团在印度佛教戒律的基础上，适应中土国情民俗，对印度佛教的戒律和管理制度进行适当的取舍和改造，逐步建立了中国化的僧团，形成了中国化的戒律清规和寺院僧团管理制度。唐代出现的禅宗丛林制度，是中国化僧团管理体制成熟的标志，其分工之精细，礼仪之森严，管理之周密，曾使宋儒感叹

“三代礼乐，尽在是矣”，称赞佛教僧团之克己“往往为吾儒所不及”。这种丛林制度集印度佛教和中华文化的智慧于一身，是中国文化、东方文化的精萃。禅宗丛林制度因为最适应中国国情，在帝王的推广下，成为中国佛教寺院普遍遵行的体制，为中国佛教兴盛数百年并深深影响整个中国文化，提供了重要保证。

另一方面，南北朝以来，中国佛教逐步形成了政府对佛教进行管理的僧官、剃度、寺额等制度，这一制度随封建中央集权制的强化而越来越完善。在政府管理、控制下生存发展，成为中国佛教的一大特色。政府佛教管理制度在处理好政府和佛教的关系，限制佛教僧团过度膨胀，从而稳定社会秩序方面，起了相当大的作用。而这一制度，也使中国佛教僧团封建化、僵化，逐渐丧失了活力。

随着社会的发展，中国僧团和中国佛教一起，自南宋末以来逐渐走向衰落，其突出的表现便是僧纲不振，戒律松弛，道风衰退，僧人俗化。整顿僧团，严格戒律，总是被热心振兴佛教的人士作为头等大事。小沙弥出身的明太祖朱元璋，及以帝王身充当大禅师的清雍正皇帝，都曾发愿整顿僧团，明太祖还制定了具体的整顿政策，然皆未能从根本上革新僧团，挽回佛教之衰运。近代努力复兴佛教的太虚大师，致力于以整理僧伽制度、重建新僧团为内容的“教制革命”，也基本以失败告终。他所要解决的问题，在当今佛教界仍然严重存在。如何通过管理寺院、培养僧才整顿佛教，使佛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并发挥其应有的教化作用，是佛教界和政府管理部门非常重视的问题。

对这样重大而具有现实意义的课题，学术界的研究却最少，至今尚无一部有分量的专著，相关论文亦不多。王永会的博士论

文《中国佛教僧团发展及其管理研究》，填补了这一空白。

王永会毕业于四川大学哲学系管理学专业，在哲学和管理学方面打下了较为坚实的基础。之后在本校宗教学所攻读佛教专业硕士、博士，五年期间，认真学习，勤于思考和炼笔，掌握了大量的佛教知识和佛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发表了多篇论文，是一位品学兼优的人才。他选取中国佛教僧团发展及其管理作为博士论文题目，颇能充分发挥自己的特长。这篇文章依据大量资料，运用文献学、史学、社会学、创造的诠释学等多种方法，按历史发展的线索，对中国佛教僧团及其管理制度从建立到完善、衰落、改革及近代僧制整理的进程，作了理性的、系统的总结，并运用调查研究的资料，对当代中国的僧团管理问题作了专章论述，提出了不少合理化建议。相信这一论文出版，会受到佛教界、佛学界和管理学界的关注，为佛教教团的管理和管理科学的发展提供有益的启迪。

陈兵

2003年5月于四川大学竹林村

## 前 言

### 一 研究现状

佛教作为一个宗教，是一个实体，有庞大的教团、众多的寺院及其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佛教传入中国的一个最重要的标志就是佛寺的形成与僧团——一种全新的社会实体与组织形态的出现。僧团作为“佛法僧”三宝之依托，是佛教传播的主体，也是佛教文化乃至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继承与发展主体。它依托寺院，对内的任务是修学佛法，对外的职责是弘扬佛法。这就决定了佛教必然要有相应的组织与管理制度、思想，对其人员、寺院、经济进行组织、协调、控制，以保证佛教内外关系的协调、教团的纯洁、佛教徒个人目标和集体目标的达成乃至整个佛教的健康发展。佛教的发展史证明，佛教做到了这一点。佛教教团组织体系之严密、管理制度之完善、管理效果之良好俱非同时代其他组织可比。

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佛教自其创立以来，由于受各个时

代及各传播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等的影响，其僧团的发展样态、组织管理制度、宗教仪轨及总体的社会职能与作用等方面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由于宗教具有一定的惰性，因而上述变化无论是良性的、积极的还是畸形的、消极的，一旦形成便固化下来，使人们对佛寺或僧团原初的、应有的情形反而模糊起来。”<sup>①</sup>清末以来，我国汉传佛教僧团衰敝不堪，且屡遭摧残，便是这种情况的反映。在当代，佛教虽欣逢盛世，面临进一步发展的机会，但由于长久以来积弊太深，僧团管理人才缺乏，组织管理制度不健全，其中还带有很多不能适应时代的内容，这于其担当起弘法利生的重任极为不利。因此，在当代对佛教僧团的形成与演化情况作一探本溯源的研究，深入了解佛教僧团及其管理随时空不同而变化的情况，进而探讨如何正本清源、兴利除弊，完善当今僧团僧制建设，对佛教的发展可以说意义深巨。

然而长久以来，在佛教研究方面，僧团及其组织管理的研究尚是一个薄弱环节。无论是研究人员，还是研究成果，都是非常少的。迄今为止无论是在管理学界还是在佛学界，都没有任何一本专门探讨佛教僧团的发展及其管理制度、管理思想、现代佛教僧团管理的走向的论著，仅有一些文章，但亦是寥若晨星。据笔者所知，在佛教僧团及其管理研究方面，目前的成果主要有：周叔迦的《法苑谈丛·佛教的制度》，Holmes Welch的《近代中国的佛教制度》，南怀瑾的《禅宗丛林制度与中国社会》，湛如的《唐宋时期的禅宗教团与清规之研究》，谢重光、白文固的专著《中国僧官制度史》，何兹全主编的《五十年来（1934—1984）汉

<sup>①</sup> 韩溥：《中印早期佛寺的形成及诸特点》，载《丛林》1999年第2期。

唐佛教寺院经济研究》，明复的《中国僧官制度研究》，业露华的《北魏的僧官制度》，左益寰《中国僧官制度》及其他一些论文。丁刚的《中国佛教教育：儒释道教育比较》对此也有所涉及。

国外在这方面的研究集中在日本，主要成果有：山崎宏《北齐的僧官昭玄十统考》《论唐代朔管内教授大德辩才》《论唐代僧官》《论唐代僧统》《关于南北朝时代的僧官探讨》《隋代僧官考》，诸户素纯《唐初有关佛教教团的管理》，中宫敏治《唐代的僧统》，冢本善隆《魏故昭玄沙门大僧统令法师墓志铭》，诸户立雄《论唐初僧官的十大德制》《北魏的僧制与唐的道僧格》，川岛常明《僧副ひつて》，小田义久《唐初的十大德》，宝永芳三《唐长安的左右功德使与左右街功德巡院》等。马来西亚贺光中也发表有《历代僧官制度考》。

综观这些研究，或者仅着眼于制度的梳理，或者重点在于国家对佛教的管理及其制度的研究，均未能结合我国佛教僧团的发展与演变的具体情况，对中国佛教僧团的管理思想、制度沿革及其未来走向作出系统探究。因而对此项研究进行补充是十分有必要的，也是有现实意义的。

## 二 研究的意义与价值

佛教僧团发展及其管理之研究的与价值也即本论文之目的，可以分如下几个方面来说：

(1) 振兴中国传统文化，重建现代文化。清末以来，西学东渐，中国文化受到激烈的冲击，如何处理好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关系成为近现代中国人一直着力探讨的问题。时至当代，



西方文明日趋没落，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代表的东方文化引起了全世界的普遍关注。尤其是随着包括海峡两岸与港澳在内的中华民族的各方面成就的取得，中国文化显示出其在人类文明的继承与现代文明的重建中的价值。这就要求我们对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与意义进行重新审视。又大陆近些年来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使得大陆在经济建设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在文化建设方面却相对落后，振兴传统文化、进行文化重建成了日益迫切的要务。佛教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组成部分，在这一重任的完成中有其不可替代的价值和作用。因而对佛教管理思想进行研究，对其管理制度、管理经验、管理智慧进行梳理与挖掘，发挥其在现代管理文化、企业文化以及社会、企业的伦理重建中的作用，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扬、现代文化的重建，自有其意义与价值。

(2) 探求佛教与时代的统整事例和适应之道，促使佛教的僧团在管理制度方面能因应时代机宜作出调整，从而促进佛教僧团在管理上的现代转型。古今中外的宗教发展史证明，一个宗教欲图存发展，必须随时代发展不断地从思想、经济、组织管理制度与方式等方面调整自身以与社会相适应，否则只能被淘汰。佛教也不例外。在现代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工商社会中，无论是在经济型态、传布方式，还是其所发挥的教化功能，都迥异于过去传统的农耕社会。佛教若要在现代社会中生存发展，必须与现代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统整调和。佛教的戒律及其他组织管理制度、方式与方法作为佛教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佛教的兴衰息息相关。相应地，佛教管理制度也必须有所契机契理的发展，即要进行制度创新。正如陈兵先生所认为的，从制度改革入手，摒弃其